

事件旅游城市居民分类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常州花博会为例

陈晓艳^{1,2}, 黄震方¹, 胡小海³, 张子昂¹

(1.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

(3.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 针对事件旅游举办城市的旅游影响感知居民分类及影响因素在文献中讨论较少. 以常州 2013 年中国花卉博览会为例, 首先对事件旅游影响感知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然后以 5 个事件旅游影响因子作为分类依据, 利用快速聚类法对居民群体进行聚类分析, 最后采用多项名义变量逻辑斯回归模型分析居民事件旅游影响感知群体分类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可以将被调查居民分为淡漠支持者、矛盾支持者、理性支持者和热情支持者; 居民分类的显著影响因素为性别、年龄和居住时间、与旅游业的相关程度、居住区域, 同时结合深度访谈分析相关因素的影响机制. 识别旅游地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 最小化潜在的消极影响, 可以最大化居民的支持程度, 对事件旅游的成功举办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事件旅游, 旅游影响感知, 居民分类,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616(2016)01-0108-09

Segment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sidents in an Event Tourism Host City

——A Case Study of China Flower Expo in Changzhou

Chen Xiaoyan^{1,2}, Huang Zhenfang¹, Hu Xiaohai³, Zhang Ziang¹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3.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It hasn't been discussed more about segment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sidents in an event tourism host city until now.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event tourism host city, taking 2013 China Flower Expo in Changzhou as an example, such research techniques as factor analysis, K-means cluster,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crosstabs and non-structural in-depth interviews are employed on segment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host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host city residents are classified into indifferent supporters, ambivalent supporters, rational supporters and enthusiastic supporters. Significant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sidents' segmentation are gender, age and residence time, the degree related to tourism, residence area. Furthermore,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orough analysis to formation mechanism beyond segmentation of host city residents. Identifying residents group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an minimize the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 and maximize the support degree of residents, which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on success of event tourism.

Key words: event tourism,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tourism impacts, segmentation of resident, influential factors

收稿日期: 2015-02-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271149、41301145)、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4YJCZH228)、江苏省教育厅 2013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2013SJD630066)、2015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KYLX15_0747).

通讯联系人: 黄震方,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E-mail: huangzhenfang@njnu.edu.cn

旅游人地关系中包含社区居民和旅游地的关系^[1]。旅游目的地居民是当地发展旅游业、开展旅游活动的相关利益主体之一,其对旅游开发及游客的态度,直接影响当地旅游业的成功与否。Murphy认为居民对旅游开发和旅游活动的欢迎或抵制程度将会影响旅游业的发展趋势^[2]。因此,对具有不同特征群体的旅游目的地居民进行识别,将潜在的消极影响最小化和全体居民的支持程度最大化,对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政策、改善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提高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4]。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群体划分研究选取的案例地主要集中在海滨、古镇、古村落等旅游发展相对成熟的旅游地^[3,5-15],旅游类型也集中在自然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等方面,而针对事件旅游举办地的居民类型划分几乎未涉及,近年来,国内外对事件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影响感知、态度、支持度和旅游期望等方面及之间关系的研究^[16-23],而对居民类型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以2013年常州第八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为例,研究事件旅游举办地旅游影响感知群体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中国花卉博览会始办于1987年,每4年举办1次,是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国家级花事盛会,被誉为中国花卉界的“奥林匹克”^[23]。2013年9月28日-10月27日在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举办第八届中国花博会(本文简称常州花博会),常州花博会主题为“幸福像花儿一样”,首次实现了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加室内室外展出,同时吸引了32个国家和地区1300多家花卉组织和企业参展,实现了五大洲全覆盖。

1.2 测量工具

事件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三大方面,居民对事件旅游影响正负面感知测量表主要借鉴了国际权威的艾普等(Ap&Crompton)旅游影响感知量表,在已有事件旅游影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23],再结合常州花博会的特点进行修订,如增加体现了花博会主题口号的“认同常州居民‘幸福像花儿一样’”和“带动花木产业的发展”2项指标。共选取并设计了25项测量指标,其中正面影响感知有16项: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本地区财政、税收收入;改善经济结构,吸引外来投资;完善当地居民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居民文化修养、礼貌好客;促进本地居民和其他地区居民文化交流;增加居民自豪感;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提高本地知名度;提高常州的国际化形象;改善当地环境和城市面貌;增加政府环保意识;增加居民环保意识及认同常州居民“幸福像花儿一样”和带动花木产业的发展。负面影响感知有9项:造成房产、物价上涨;因为花博会过度投资;花博会的举办,对少数人有利;人口流动突然增大,居民生活受到干扰;增加居民与外来者的冲突;破坏或干扰本地传统文化;交通人口过度拥挤;噪音、垃圾增多;增加犯罪率。居民对事件旅游的总体态度和支持行为的测量指标设计主要借鉴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21,23-26],总体态度3个测量指标分别为:常州举办中国花博会我非常激动;常州举办花博会会增加常州城市魅力;举办花博会积极影响会大于消极影响。支持行为4个测量指标分别为:支持常州花博会的举办;支持对游客的服务(如问路);愿意在花博会中做一名志愿者;支持将来常州举办更多的重大活动。论文采用5分制的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赞成,5=非常赞成,第二部分为居民个人信息。调查时间为2013年9月花博会举办期间,在花博会园区内,以及常州市红梅公园、市民广场、万达广场、南大街、紫荆公园、青枫公园、湖塘乐购等多个市民休闲放松的场所,对常州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500份,回收491份,其中有效问卷46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2%。

1.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两种基本方式,采用SPSS21.0软件分析。数据分析首先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其次对居民事件旅游影响感知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然后以提取出的因子为分类依据对居民群体进行聚类分析,并采用了单侧方差分析的薛费多变量对比检验(Scheffe Multiple Comparisons)进行显著性检验并结合不同类型的居民对常州花博会所持的态度和支持行为特征,对居民分类进行命名,再以相关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为自变量,以聚类结果为因变量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建模来识别聚类结果的影响因素,最后对影响因素与居民类型进行了交叉列联表分析,结合现场调查时的深度访谈进一步分析相关因素的影响机制。

2 事件旅游城市居民群体聚类分析

2.1 样本社会统计学特征

本文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有效问卷460份中男女比例基本适宜;年龄以20岁-30岁这组人群最多,占46%,其次较多的为31岁-40岁组别,占20.6%;学历以大专和本科居多,占52.7%;职业构成多样化;月收入主要集中在2000元~4000元,其中2000元以下为32%,低收入群体比例较高;被调查的居民主要来自新北区(32.2%)、武进区(29.3%);居住时间分布较均匀,整体调查样本结构合理,适宜展开具体分析论证.

表1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项目	内容	比例/%	项目	内容	比例/%	项目	内容	比例/%
性别	男	44.8	性别	学生	24.2	月收入	4001元~5000元	9.8
	女	55.2		企业职工	25.3		5001元~6000元	4.5
年龄	20岁以下	12.0	年龄	公务员	4.3		6000元以上	5.2
	20岁-30岁	46.0		医生	2.6	居住区域	武进区	29.3
	31岁-40岁	20.6		教师	4.5		新北区	32.2
	41岁-50岁	14.1		自由职业者	19.1		天宁区	18.3
	51岁-60岁	3.7		退休人员	5.5		钟楼区	13.8
	60岁以上	3.7		全职家庭者	4.3		戚墅堰区	6.4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2.2	其他	10.2	居住时间		3年以下	15.3
	高中及中专	30.3	月收入	2000元以下		32	3年-10年	21.0
	大专与本科	52.7		2000元~3000元		27.7	11年-20年	22.4
	研究生及以上	4.8		3001元~4000元		20.8	21年-30年	24.6
							30年以上	16.7

2.2 旅游影响感知指标的因子分析

首先,针对常州居民对花博会旅游影响感知的25个描述项进行了KMO统计量分析和巴特勒球形检验(Bartlett's test).利用SPSS21.0软件进行处理得到,KMO的检验值为0.874,Bartlett's球形检验值为4783.687,自由度为300,相伴概率 $P=0.000$,拒绝原假设,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统计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采用主成分萃取方法提取公因子,并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旋转,按照常用的特征根大于1标准,共萃取出5个公因子.为了提高因子分析的结果,将因子载荷小于0.5的旅游影响感知项删去,最后有24项参与因子分析,共萃取出5个公因子如表2所示.

事件旅游影响居民感知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2,且各个公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均在0.70以上(见表2),符合分层面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最低要在0.50以上、最好高于0.60的标准^[27],说明问卷设计信度较好,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5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58.644%.

通过因子分析,第一个因子在改善当地城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完善当地居民公共基础设施、提高政府和居民环保意识以及提高居民素质等积极影响方面感知的变量载荷较高,可称为社会文化和环境收益因子.第二个因子的载荷主要是在事件旅游举办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上,可称为社会文化和环境成本因子.第三个因子主要是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税收、吸引外资、增加就业方面载荷较高,称为经济收益因子.第四个因子在提高常州知名度和国际化形象方面载荷较高,可称为形象改善因子.第五个因子在造成房产、物价上涨、花博会受益不均及过度投资方面载荷较高,称为经济成本因子.

表2 居民事件旅游影响感知的因子分析
Table 2 Factor analysis of residents' perceived event tourism impacts

提取因子	问卷项目	因子载荷	信度系数	特征根值	贡献率
因子 1: 社会文化和环境收益	增加居民环保意识	0.709	0.848	6.490	25.961
	提高居民文化修养、礼貌好客	0.678			
	完善当地居民公共基础设施	0.666			
	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0.654			
	改善当地环境和城市面貌	0.648			
	增强政府环保意识	0.580			
	认同居民“幸福像花儿”一样	0.580			
	增加绿化面积, 带动花木产业	0.543			
因子 2: 社会文化和环境成本	增加居民与外来者的冲突	0.787	0.861	4.134	16.537
	增加犯罪率	0.781			
	破坏或干扰本地传统文化	0.760			
	交通人口过度拥挤	0.725			
	噪音、垃圾增多	0.705			
	人口流动增大, 生活受到干扰	0.680			
	增加本地区财政, 税收收入	0.734			
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	0.716				
增加就业机会	0.656				
因子 3: 经济收益	改善经济结构, 吸引外来投资	0.617			
	提高本地知名度	0.753	0.716	1.254	5.017
	提高常州的国际化形象	0.703			
增加居民自豪感	0.576				
因子 4: 形象改善	因为花博会过度投资	0.745	0.709	1.081	4.323
	造成房产、物价上涨	0.701			
	花博会的举办, 对少数人有利	0.548			
因子 5: 经济成本					
累计贡献率					58.644
样本总体信度系数			0.792		

2.3 居民聚类分析

本文借鉴了旅游地居民类型划分研究成果^[10-11, 13-15], 将事件旅游影响感知的 5 个因子作为分类变量对被调查居民进行聚类分析, 采用 SPSS21.0 软件快速聚类法即 K-均值聚类法(K-means cluster). 根据林震岩^[28]的研究建议, 聚类数最好是 2 类-4 类, 每个类占样本总数的比例至少达到 10%, 为了进一步检验分类的效果, 采用了单侧方差分析的薛费多变量对比检验进行显著性检验, 聚类及检验结果显示, 分为 4 类最为显著, 结果见表 3.

表3 基于事件旅游影响感知因子的常州居民聚类分析

Table 3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residents in Changzhou based on factors of perceived event tourism impacts

旅游影响 感知因子	样本总体 平均	I 类 (120 人)	II 类 (146 人)	III 类 (104 人)	IV 类 (90 人)	F 值及其 显著性	薛费 (scheffe) 多变量对比检验					
							I - II	I - III	I - IV	II - III	II - IV	III - IV
因子 1	4.06	4.23	4.01	4.43	3.47	72.485***	***	n	***	***	***	***
因子 2	3.03	3.91	2.60	2.64	3.01	119.828***	***	***	***	n	n	*
因子 3	4.09	4.08	4.12	4.62	3.43	104.685***	n	***	***	***	***	***
因子 4	4.23	4.24	4.19	4.64	3.86	29.481***	n	**	***	***	n	*
因子 5	3.28	3.71	2.53	3.39	3.83	103.877***	***	***	***	***	***	n

注: *, **, *** 分别代表 0.05、0.01、0.001 水平下显著; n 代表 Scheffe 检验不显著. 表中样本总体平均值和各聚类的因子分值为均值 (1=非常不赞成, 5=非常赞成).

从表3花博会旅游影响感知因子的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方差分析 F 值及其显著性可以说明5个因子之间有显著的差异. 薛费多变量对比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因子1在I类和III类之间;因子3在I类和II类之间;因子5在III类和IV类之间;因子2和因子4分别在2种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达不到显著之外,其余各项因子在4种类型之间的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从不同类型的居民对常州花博会所持的态度和支持行为特征(表4)中可以看到,虽然4种类型的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支持程度不一,但总体上都比较支持常州花博会的举办,由此可以认定4种类型的居民都属于事件旅游的支持者. 各类型具体的特征如下:

I类:包括120人,占全部样本的26.1%. 这类居民群体认可花博会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收益、经济收益和形象改善等正面影响,同时对花博会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感知比其他3类居民更为强烈,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感知较为强烈,仅次于IV类居民,可以将他们归结为矛盾支持者.

II类:包括146人,占全部样本的31.7%. 这类居民群体既认可花博会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收益、经济收益和形象改善,同时也关注花博会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及经济方面所产生的问题,对花博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持中立态度,这类居民对花博会的支持程度大于I类群体,但却不如热情支持者(见表4),这类居民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花博会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可以将他们归结为理性支持者.

III类:包括104人,占全部样本的22.6%. 这类居民群体对常州花博会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收益、经济收益和形象改善正面影响感知非常强烈,为4类群体中最高者,他们对花博会的举办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和支持行为,因此将这类居民视为热情支持者.

IV类:包括90人,占全部样本的19.6%. 这类居民对花博会社会文化和环境收益、经济收益和形象改善正面影响感知为4类居民中最低者,同时对经济成本因子感知却是4类居民中最为强烈,这类居民虽然也支持花博会的举办,但其支持度远不如其他3类居民(见表4),因此将这类居民视为淡漠支持者.

表4 不同聚类居民群体对事件旅游总体态度和支持行为的均值

Table 4 The mean value of overall attitude and supportive behavior towards event tourism of different residents group

总体态度和支持行为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常州举办中国花博会我非常激动	3.68	3.87	4.15	3.43
常州举办花博会增加常州城市魅力	4.10	4.13	4.49	3.83
举办花博会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3.91	3.97	4.18	3.64
作为居民,支持常州花博会的举办	4.07	4.20	4.48	3.73
作为居民,支持对游客的服务(如问路)	4.15	4.24	4.48	3.87
愿意在花博会中做一名志愿者	3.81	3.96	4.23	3.66
支持将来常州举办更多的重大活动	4.04	4.19	4.52	3.89

3 居民群体分类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居民类型结果为因变量,以相关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了多项逻辑斯回归建模以识别聚类结果的影响因素. 逻辑斯(Logistic)回归可以对定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能够更细微地刻画自变量是名称变量对因变量是多分类变量的回归问题. 由表5可知:该模型的-2倍对数似然值为979.910,似然比检验卡方值为146.607,在0.0001水平呈现显著水平,说明整个模型拟合度高,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6可知,性别、年龄和居住时间、职业与旅游相关程度、居住区域对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居民群体分类有显著影响. 同时对5个显著影响因素与4个居民类型进行了交叉列联表分析(见表7),结合现场调查时的深度访谈以进一步分析相关因素的影响机制.

表5 居民事件旅游影响感知聚类的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整体检验

Table 5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of resident clusters based on perceived event tourism impacts

	模型拟合标准	似然比检验		R平方	
	-2倍对数似然值	卡方	显著水平	Cox和Snell	Nagelkerke
最终模型 a	979.910	146.607	0.000**	0.273	0.292

注:** $p < 0.01$; a: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分类=常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与旅游相关程度,月收入,居住区域,居住时间.

表6 居民事件旅游影响感知聚类的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Table 6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likelihood ratio tests of resident clusters based on perceived event tourism impacts

	简化模型的-2倍对数似然值	卡方	显著水平
常数	979.910	0.000	
性别	987.985	8.076	0.044**
年龄	1 010.313	30.404	0.011**
文化程度	988.400	8.490	0.486
与旅游业相关程度	986.878	6.969	0.073*
职业	1 010.018	30.108	0.181
月收入	995.636	15.726	0.400
居住区域	1 001.303	21.394	0.045**
居住时间	1 007.902	27.992	0.006**

注:**代表0.05水平下显著,*代表0.10水平下显著.

表7 基于不同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居民类型交叉列联表

Table 7 The cross contingency table of residents type based on the different social demographic

%

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		冷漠支持者	矛盾支持者	理性支持者	热情支持者
性别	男(192人)	25.5	24.0	28.1	22.4
	女(268人)	15.3	27.6	34.3	22.8
年龄	20岁以下(75人)	16.0	24.0	36.0	24.0
	20岁-30岁(187人)	21.9	21.9	35.3	20.9
	31岁-40岁(78人)	23.1	20.5	24.4	32.1
	41岁-50岁(68人)	16.2	35.3	38.2	10.3
	51岁-60岁(27人)	14.8	29.6	22.2	33.3
	60岁以上(25人)	16.0	52.0	8.0	24.0
居住时间	3年以下(68人)	14.7	33.8	29.4	22.1
	3年-10年(85人)	12.9	28.2	34.1	24.7
	11年-20年(112人)	19.6	25.9	33.0	21.4
	21年-30年(89人)	31.5	13.5	36.0	19.1
	30年以上(106人)	17.9	30.2	26.4	25.5
居住区域	武进区(159人)	18.9	28.3	29.6	23.3
	新北区(126人)	23.8	22.2	29.4	24.6
	天宁区(95人)	14.7	22.1	36.8	26.3
	钟楼区(40人)	17.5	42.5	22.5	17.5
	戚墅堰区(40人)	22.5	22.5	45.0	10.0
与旅游业关系	从事旅游业(16人)	6.3	18.8	25.0	50.0
	未从事旅游业(444人)	20.0	26.4	32.0	21.6

3.1 性别

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居民中比例较高的居民类型都是理性支持者,但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女性居民中冷漠支持者最少,男性居民中热情支持者最少,这与男性性格内敛、较为冷静客观以及女性性格外向、较为热情感性这种性格特征有一定的关系.在访谈中也验证这一研究发现,“常州举办花博会这是好事啊,能让常州知名度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提高,我全力支持”(女性被访居民),“常州作为三线城市,能举办国家盛事还是很光荣的,但这个花博会到底能为常州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场馆怎样可持续利用?现在还不好定论”(男性被访居民).女性被访居民回答常常较为感性、热情,而男性居民被访时表现得较为谨慎和客观.

3.2 年龄和居住时间

从调查中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居住时间的增加,理性支持者和热情支持者增多.短期居住时间(3年以下)的居民主要为矛盾支持者,而中期居住时间(3年-30年)的居民大多数为理性支持者(见表7).居民的社区依恋随着居住时间、家庭关系与社交改进而增加^[13],Faulkner发现社区依恋较高的居民更支持

旅游开发并且对旅游业社区生活质量的影响更乐观^[29]。长期居住时间(30年以上)的居民在热情支持者类型中比例最高,为25.5%,但在长期居住的居民中30.2%以及60岁以上的居民52%为矛盾支持者,由于老年人生活习惯以及存在对自己故乡传统观念的固守,会对旅游开发持有比较保守的态度。在城市地区,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承担者(20岁-60岁)中理性支持者和热情支持者较多(见表7)。

3.3 与旅游业的相关程度

这部分主要由是否从事旅游业来测量。在旅游从业者中,热情支持者的比例高达一半,而淡漠支持者仅占6.3%,说明从事旅游业的人更了解事件旅游给城市带来的巨大效益和长期效应,更积极支持旅游业的发展。理性支持者在未从事旅游业的居民中显得比较突出(占32%),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事件的相继举行,广泛的宣传和城市知名度的迅速提高,使很多城市居民对事件旅游都不再陌生,不会成为旅游“文盲”,他们既关注事件旅游带来的正面影响,同时也能客观公正地看待负面影响。总之,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的居民比未从事旅游业的居民对待旅游业的态度更加积极。

3.4 居住区域

本文使用了常州市区5个行政区域作为居民居住区域进行划分,常州花博会举办地点位于武进区嘉泽镇,毗邻太湖。调查发现,理性支持者在5个行政区域的比例都是其他类型中相对较高者,其中戚墅堰区比例最高(45%),淡漠支持者较多出现在新北区(23.8%)和戚墅堰区(22.5%)这两个距离嘉泽镇相对较远的行政区域。韩国圣发现距离旅游景区或旅游公路越近的居民越有大量接触接待旅游者的机会,从旅游业中直接获利就越多,所以就比较明显地感受到旅游业的积极影响,而距离偏僻的居民则更多地感知到旅游业的消极影响^[13]。本文在深度访谈中也验证了这个研究发现,如“新北区离嘉泽镇那么远,想去做点小买卖还不够来回路上折腾的”,“我们这的人(戚墅堰区)跑到武进去挣钱,人生地不熟,肯定挣不了什么钱”,“戚墅堰区也没什么资源,经济条件不如其他4个区,能举办什么事件让我们改善生活和解决就业啊?”武进作为花博会举办行政区,4种类型的居民分布比例大体相当,其中理性支持者较多(29.6%),淡漠支持者较少(18.9%),也验证了这个研究发现,但比例差距不大的原因可能与武进行政区域面积辽阔,呈u字型包围其他4个行政区域,距离嘉泽镇远近皆有关。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经过研究发现,被调查居民对花博会的举办总体上持积极的态度,但不同类型居民对事件旅游的举办存在明显差异,根据居民对花博会举办的旅游影响感知不同,可以将被调查居民分为矛盾支持者、理性支持者、热情支持者和淡漠支持者。

(2)为了更准确识别对聚类结果有显著影响的社会因素,本文以多项逻辑斯回归模型从多个因素中识别出对常州市举办花博会的居民分类群体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性别、年龄和居住时间、与旅游业的相关程度、居住区域,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群组之间的特征,同时结合深度访谈分析相关因素的影响机制。

(3)目前,在常州花博会举办期间被调查居民中尚未出现反对者,但随着花博会举办结束后及居民对事件旅游的认识提高,居民对事件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及支持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矛盾支持者可能会发生转变,居民中会出现部分的反对者和憎恨者,在国内学者卢松^[3]研究中得到一定的证实,而且可能数量会有增长的趋势。

(4)事件旅游举办方和政府及各级社区应重视居民作为旅游相关利益主体之一的重要作用。首先深入了解和识别旅游地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最小化潜在的消极影响,可以最大化居民的支持程度,对事件旅游的成功举办有一定的影响;其次有针对性地满足居民对事件旅游的需求,如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常州来说,市民对常州花博会的期望并未集中在经济收益方面的影响,而是提高本地知名度和提高常州的国际化形象等社会文化影响方面,所以举办事件的政府和相关机构,应事先调查居民对事件举办的期望和需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力争实现,进而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和支持;最后强化事件旅游正面影响的长期效应,应持续利用事件举办相关场地和场馆,举办与之前事件旅游主题相关的活动,为城市事件业的开发、规划与运营积累经验和提供指导,对常州未来成功举办国际旅游重大事件有所裨益。

4.2 讨论

目前,在国内外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群体划分中,结果较为分化,除了较为常见的不同态度的支持者,

也已出现其他不同类型的群体,如中立者、反对者,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较一致,但尚未出现中立者和反对者,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针对的是在城市举办的事件旅游作为居民分类的感知对象,事件旅游与其他类型的旅游形式相比在于有一定的时限,而且本次调查是在旅游事件举办期间,城市形象得到广泛宣传,知名度的提高,以及各项旅游活动的密集展开,给居民带来的正面影响感知比较强烈,同时,花博会举办地武进嘉泽镇,位于常州西太湖畔,远离市区,所以常州市其他区域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负面感知不强,但对于在常州各大公园纷纷开展的市花认养、花卉知识宣传等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感知更加强烈。因此,居民对事件旅游的举办持肯定态度的多,否定的少。

另外,基于事件旅游影响感知的居民类型研究不应仅仅只关注其举办期间,对于举办前、举办后居民类型与举办期间是否存在变化,其变化趋势和影响机制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基于花博会属于常州市的一件盛事,因此在进行居民居住区域划分时以行政区域作为分类标准,但从研究结果来看,尺度有些过大,建议日后研究以居民居住地与事件旅游举办地距离作为划分依据会更有实际意义;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事件旅游与居民感知度的关联性、规律性探索,也是日后可进行深入研究的方向和内容。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数据收集过程中未考虑调查对象地区人口样本的类型,造成抽样的不等概率性。

[参考文献]

- [1] 黄震方,黄睿. 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地理学理论透视与学术创新[J]. 地理研究, 2015, 34(1): 15-26.
- [2] MURPHY P.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M]. London: Routledge, 1985: 12-38.
- [3] 卢松,张捷,唐文跃,等.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类型划分:以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4): 69-75.
- [4] 吴畏,于佳祥,马国义,等. 环京津地区居民体育旅游影响态度类型研究[J].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11, 25(2): 10-13.
- [5] DAVIS D, ALLEN J, COSENZA R. Segmenting local residents by their attitud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oward tourism[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 27(2): 2-8.
- [6] ELIZABETH F, BILL F. Host community reactions: a cluster analysi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3): 763-784.
- [7] SCHROEDER T. Host 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tourism's impacts: a cluster analysis[J]. Visions in leisure and business, 1992, 10(4): 43-48.
- [8] PÉREZ E A, NADA J R. Host community perceptions: a cluster analysi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4): 925-941.
- [9] 苏勤,林炳耀. 基于态度与行为的我国旅游地居民的类型划分:以西递、周庄、九华山为例[J]. 地理研究, 2004, 23(1): 104-114.
- [10] 黄玉理.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丽江古城居民类型划分[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7, 19(4): 58-62.
- [11] 张侨. 基于旅游认知的滨海旅游地居民类型研究:以三亚市为例[J]. 科技和产业, 2010, 10(11): 36-38.
- [12] 严澍. 羌族地区居民对灾后村寨旅游开发的态度归类研究:基于三个羌寨的调研数据[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5): 138-142.
- [13] 韩国圣,张捷,黄跃雯,等.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自然旅游地居民分类及影响因素:以安徽天堂寨景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 128(6): 110-116.
- [14] 张兴华,韩宝平,史春云,等.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居民类型划分:以周庄古镇为例[J]. 淮海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19(3): 63-66.
- [15] 张俊英,马耀峰,陈蓉,等.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乡村旅游地居民类型划分: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小庄村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3, 27(4): 204-208.
- [16] DOGAN G, KENDALL K W. Hosting mega events: modeling locals suppor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3): 603-623.
- [17] OHMANN S, JONES I, WILKES K. The perceived social impacts of the 2006 Football World Cup on Munich residents[J]. Journal of sport tourism, 2006, 11(2): 129-152.
- [18] HYUN J K, DOGAN G, SOO-BUM L. The impact of the 2002 World Cup on South Korea: comparisons of pre-and post-gam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1): 86-96.
- [19] GIRISH P, SAMEER H, ROBIN N, et al. London residents' support for the 2012 Olympic Gam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verall attitud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6): 629-640.
- [20] 郭英之,臧胜男,彭兰亚. 居民对旅游重大事件感知态度与期望的实证研究:以上海世博会为例[J]. 上海应用技术学

- 院学报,2009,9(1):9-14.
- [21] 许春晓,柴晓敏,叶莉. 杭州世博会居民感知与支持关系变化研究:基于SEM的纵向研究[J]. 旅游学刊,2009,24(10):69-73.
- [22] 陈楠,乔光辉. 游客及本地居民对重大事件活动旅游期望的实证研究: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例[J]. 兰州学刊,2009(3):184-188.
- [23] 陈晓艳,马静卿,李红. 居民对旅游重大事件态度、支持度与期望的实证研究:以2013年常州第八届中国花博会为例[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2):89-94.
- [24] NUNKOO R,GURSOY D.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an identity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9(1):243-268.
- [25] 王起静. 居民对大型活动支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J]. 旅游科学,2010,24(3):63-74.
- [26] 汪德根,王金莲,陈田,等.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J]. 地理学报,2011,66(10):1413-1426.
- [27]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244.
- [28] 林震岩. 多变量分析:SPSS的操作与应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97.
- [29] FAULKNER B,TIDESWELL C. A framework for monitoring community impacts of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1997,5(1):3-28.

[责任编辑:丁蓉]

(上接第107页)

- [5] 葛敬炳,陆林,凌善金. 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2009,29(1):134-140.
- [6] 麻学锋,孙根年. 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与机制分析[J]. 旅游学刊,2012,27(3):36-42.
- [7] 余凤龙,黄震方.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J]. 经济管理,2013,511(7):125-134.
- [8] 杨亚丽,孙根年. 城市化推动我国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动态分析[J]. 经济地理,2013,33(7):169-175.
- [9] 王兆峰,余含. 基于交通改善的湘西旅游城镇化响应时空分异与机制研究[J]. 经济地理,2013,33(1):187-192.
- [10] 周少雄. 试论旅游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关系[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2,124(2):55-58.
- [11] 吴国清. 区域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区域化研究:兼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旅游互动[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7(1):51-55.
- [12] 赵磊. 城市化对典型省际区域旅游业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1996-2008:以江苏、河南和陕西为例[J]. 人文地理,2011,121(5):99-104.
- [13] 钟家雨,柳思维,熊曦.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 经济地理,2014,34(2):187-192.
- [14] 徐洁,华钢,胡平. 城市化水平与旅游发展之关系初探: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序列动态计量分析[J]. 人文地理,2010,120(2):85-90.
- [15] 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等. 基于耦合模型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旅游学刊,2013,28(1):62-68.
- [16] 马丽,金凤君,刘毅. 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J]. 地理学报,2012,67(10):1299-1307.
- [17] 曹芳东,黄震方,吴江,等. 转型期城市旅游业绩系统耦合关联性测度及其前景预测:以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2012,32(4):160-166.
- [18] 方叶林,黄震方,段忠贤,等. 中国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研究[J]. 经济地理,2013,33(12):159-201.
- [19] 乔家君. 改进的熵值法在河南省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中的应用[J]. 资源科学,2004,26(1):113-119.
- [20] 廖重斌.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热带地理,1999,19(2):171-177.

[责任编辑:丁蓉]